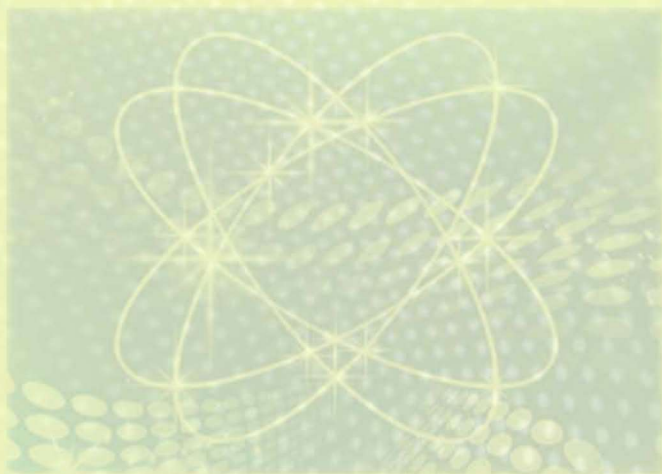


学府与政府

——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

刘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
1928~1935 / 刘超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3(2015.10 重印)
ISBN 978-7-201-09018-4

I. ①学… II. ①刘… III. ①清华大学-校史-研究
-1928~1935 IV. ①G649.28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234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26.25 印张

字数：400 千字

定 价：68.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那个业已远逝的年代

献给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时光

也献给我们生活着的土地和岁月

序 一

刘超同志对学术一直有着强烈的志趣。他好学深思,英锐而沉潜,富有灵心善感和独立创见。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刘超同志甘坐冷板凳,埋头苦干,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他有大眼界、大情怀,耐得住大寂寞。他长期致力于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和学人的研究,十年如一日。

本书所研究的主要是全面抗战前的清华大学。

我上大学时已是抗战时期,但抗战前我在北平念中学,并接触过当时的一些大学生,所以我对当时北平一些有名的大学如北大、清华还是有所了解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一批世界级水准的知名学府。这些院校规模不一、模式迥异,但都各具特色,从中涌现了一大批名家和大师,推动了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当时中国经济极为落后、国难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难能而可贵的,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刘超同志的这部作品就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其中有的论述或可商榷,但这种潜心向学的精神和努力是值得鼓励的。读史明智,这一研究不仅有益于增进今人对民国大学的认识,也有益于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事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江山代有才人出。我期待能逐步营造出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好环境。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把握当下,不负韶华,踏实努力,实现各自的梦想。

是为序。

2014年12月6日于清华园

序 二

刘超把他即将付梓的大作《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的电子版书稿发给我,邀我为之作序。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与刘超相识已有八九年,学术交往甚密。我们初识时,他已先后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一南一北两所名校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本科主修政治学及行政管理学,硕士阶段主攻中共党史。八九年前,他来清华历史系读博,主攻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博士后阶段进清华教育研究院,研究重点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从本科到博士后,虽然所学专业各不相同,但他对现代大学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北方名牌学府的运行体制和著名学人的关注、资料搜集和研究始终没有间断。他对该领域的真实情况颇有穷追不舍、一探究竟的兴趣和志愿。他当时来找我谈读博的想法时,说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他对学界的熟悉程度、他的执着的研究态度,以及沉湎学术的志趣,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刘超读书极为勤奋,量大面广,领悟力强,才思敏捷。在我所接触的年轻一辈学子中,有如此优异的学术天资的青年,的确是不多见的。经常是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拿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在读博期间,他已发表不少文章,在学界中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了,受到不少名家的认可和欣赏。亦因此,他于2009年秋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清华特等奖学金的人文社科学院的研究生。当时刘超已远赴日本国立东北大学访学,他本人无法来到评奖大会现场,有关方面便邀请我出席。作为导师,在介绍他的情况时,我说,刘超发表文章,有点像“井喷”一样,按都按不住。尽管我一向鼓励学生在读博期间以读书为主,不要急于发表太多论文,但刘超的确才华横溢,与众不同。

由于他研究的着力面过宽,在确定博士论文的主题时,遇到了些困难。经过反复研究商议,最后才将主攻阵地锁定到清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快速成长的主要机制上。当时确定这么一个主攻阵地,我的考虑主要是:首先,刘超有研究大学史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趣和较好基础;其次,各种形式和风

格的清华校史著作,虽然数量庞大,但对清华传统中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基因揭之未深,在我的认识中,仍较散乱,需要继续寻找更加满意、核心的答案;再次,我在研究蒋廷黻的过程中,开始探摸到罗家伦于清华快速成长的特殊地位,而海内外学者对罗氏与清华成长的关系尚无深入细致的讨论。我认为,以刘超的才学,在此阵地上做出新的成绩是完全可能的。不巧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当时刘超的精力无法完全聚焦到主攻点上,致使博士论文答辩时,仍略感粗疏仓促。好在他的博士后阶段是在清华教育研究院度过的,这为完善他的博士论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现在读到的这部书稿,读起来清新顺达、丰满连贯。全书虽然只截取了清华百年校史中的七八年这么一个短暂的阶段进行切面剖析,但小中见大、短中寓长,视角独特,深透细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全书不仅有新材料、新分析、新思想,而且在广度、力度、深度上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众多清华校史论著中,真可以说得上是独辟蹊径、卓有建树的。刘超将政治作为一个核心因素纳入影响清华发展的“变量系统”,进行深入的系统分析,揭示出政府与学府之间、学府内部政与学之间正向互动的权力运作动态轨迹,揭示出民国顶尖学府的知识精英与国家顶层决策者之间的隐秘关联,揭示出老清华学术建设的政治意图和“教授治校”体制在政治、管理层面上的地位,等等。这些都具有开拓的、先行的性质。这些成绩将大学校史的研究和书写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也可引发人们对诸多相关问题的新思考、新探索。

这部书稿的成功,从治史途径的角度来说,我以为有几点是值得再多说几句的:

其一,问题意识。这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在学术研究中,若要切实做到准确地抓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抓不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问题,学术研究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甚或不能成其为学术研究,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学术领域中长期以来并不少见。抓不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所谓创新就无从谈起。而要抓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问题,则必须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前沿进行全面准确的调查、对比、分析;对基本史料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为我所用式的对待,而是真正读懂、读通,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刘超老老实实在地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所以就抓住了清华1928年至1935年快速成长的主因。究竟是清华

的独立性,是梅贻琦校长个人的领导能力,还是政府、政治与学府、学术的正向互动这个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经过他的周密深入的剖析,一团长期以来阻碍人们认清清华真面貌的迷雾被驱散廓清了。

其二,语境分析。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虽然也不是很新鲜了,但在实际运用之中,存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单层面的、穿衣戴帽式的背景分析,这种一般性的历史背景的描述和概括,对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事实来说,都是共同的。所以,对一般背景的了解,几乎无助于深入分析一个具体历史事实的特殊性及与其他事实的具体联系。语境分析至少应当建立大、中、小三个层面,一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事实,定有其所处的直接的小环境、比较间接的中环境和更为开阔虚疏的大环境。这大、中、小三个层面的环境不是割裂分离的。他们之间纵横交织,呈网络状态,或如一棵树、一株花处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一样。历史是生长的历史,语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用变化的眼光观察语境、分析语境,所建立起来的历史语境,才是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所以语境也不是纯客观外在的东西。应当说,语境亦包括历史主导人物的心境,但是对历史人物的心境不可猜想臆断,而应依据更细密的考察加以揭示。刘超这部书稿在语境分析的问题是颇为自觉的。他很注意构筑清华快速成长的七八年,内内外外的政治生态、人际网络和学术环境。通过这种构筑,使这部书稿达到了比较精细、精致、精到的程度,同时也使枯萎冰冷的历史陈述活跃起来,绽放出一种令人鼓舞的生机和朝气。

其三,融会贯通。学术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求通,因此不可拘于一隅。研究现代大学史、研究知识精英,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若无跨界的胆识、视野和功力,若无正确的方法和比较宽厚的基础,是难以做出新成绩的。刘超这部书稿打通了历史学与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民国史、思想史、制度史、学科史等多学科领域之间的森严壁垒和局限,融学术与政治、教育与管理、校史与国史、历史与哲思、文法与理工、思想与行动等多因素于一体,使古今、中西、文理、内外贯通交汇于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而不露痕迹,研究对象的内外生长脉络伸向了哪里,就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哪里。这样,历史的原生态就会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加合乎事实,因而也会给人们带来某种喜悦的新颖感,甚至心灵上的某种莫名的震撼。这是一部高水准的史学著作,其所蕴含的艺术性必然会产生独特

的魅力。我为刘超的学术进展而高兴。

当然,无可讳言的是,书稿中目前仍有明显不足之处,如个别地方重复其词,略欠精炼、明快等,读者自可鉴之。是为序。

蔡乐苏

2014年12月于纽约

序 三

时间过得很快。2007年年底,我刚到厦门不久,恰好云南师范大学要开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讨会,刘超当时还在北京读书,想参加这个会,却苦于没有路费。我到厦门时,山西有两个企业家朋友帮忙,给了我一点小钱,所以我答应刘超的路费我来出。当时还在社会上漂泊的饶佳荣也是同样情况,想参加会议,但没有路费,我也按同样的方式处理了这件小事。佳荣后来译出了易社强的名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大陆和台湾出了两版,极受读者欢迎。我稍长他们几岁,看到好读书的青年,有一种想帮助他们的冲动,可惜自己能力实在有限,至今帮助过的青年很少。

记得当时在昆明,本来会议结束后要和刘超聊聊天,但想不起由于什么原因错过了机会,此后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我和刘超可以说只是匆匆忙忙见过一次,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也马上要到退休的年龄,实话说,我内心也真是在盼望早一天退休,然后回到北方,回到我一向就喜欢的北京。倒不是我在厦门不愉快,而是我太喜欢北京了。北京的空气可能不好,但北京好玩的人和事多,人不是只为空气活的,所以北京人最多、房最贵,北京还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无处可及。我家在太原,现在有了高铁,我可以当天来回,所以在我设想中还有几年北京时光,但这只是一种梦想,能不能成为现实,只有天知道了。

刘超非常能写,又有极强的学术能力,他后来出过两本书,都是我写过序的。刘超出身非常之好,本科在南京大学,硕士在北京大学,后来在清华读博士。他当年出第一本书时,让我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人来写序,我不知道刘超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从这件事中感觉到了刘超对我的信任。此类事也许在旁人看来是麻烦,但刘超敢和我开口,而且我也马上答应,这是建立在我们内心对彼此学术工作和人格有直觉的信任,我感到非常温暖。我相信人生的机遇,不相信个人的能力;再有本事的人,也需要有一个直接的推动,这个推动只有人能承担。做官做学问都一样,最后总有一个具体的人是真正的动

力,个人在再好的制度中也需要人的帮助,所以我只相信人,不相信制度。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也要有机遇,而机遇只有人能提供。

这些年,我和刘超也有过不少学术交流和讨论,我对他的研究能力毫不怀疑,但我对他开创学术领域的追求有过提醒。我感觉他在目前已有的学术领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我期待他能有一个新的别开生面的研究天地,也就是说,我期待他能做一个别人从来没有碰过,而由他首先做了,而且这个学术领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的领域。刘超有如此优越的学术条件,用何炳棣当年经常说的话,如果不做第一流学问,太可惜了。

本书是刘超的博士论文,刘超又想到让我来写序,本来这次我不想写了,但刘超信任我,可能也感觉到我好说话,所以在最后关头,我没有推辞。刘超是史学出身,但研究兴趣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方面;而中国高等院校中,我个人以为不是所有学校都有价值成为好的研究对象,现在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选择一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但很难出彩,因为那些学校历史中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清华是一个好的研究对象,可惜刘超不是第一个闯进来的,这就非常被动,因为不能成为破题的人,虽然做得极为出色,但在学术上的影响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研究中国现代大学很难切断与当下现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死的学术对象,而是一个活的学术对象。为什么西南联大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而其他大学可能就不具备这个因素?刘超选择清华大学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他是如何考虑的,我一时还想不清楚,但这个角度如果不能引起人们对今天政府和大学关系的思考,那么这个研究对象和现实间的微妙关系可能就是需要再思考的。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感受的历史研究,考证一个字的来历和读音都有现实感受,纯粹的考古学报告也有作者的感情在其中,更何况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呢?

记得刘超在信中还提醒过我,说他的研究中可能有些观点和我不同,希望我能理解。我一时还没有想到我有什么学术观点。刘超的研究,无论史料还是方法都远胜于我当年那点随感性质的研究,但我感觉当今青年一代学人的研究,在现实情感上可能和我不同。我是为了否定中国当下教育制度才从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中寻找切入点的,我的追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批判现实,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做的是纯粹学术研究,我做的是思想启蒙。我选择储安平 and 《观察》来研究的目的,也是否定当下的新闻制度,这些苦心当时不

好明说,但读者都能感受到。我不知道这是研究者的优点还是缺陷,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刘超一起深入交流。

是为序。

谢 泳

2014年12月29日于厦门

目 录

绪 论 民国大学的面相:学术乎? 政治乎? /1

第一章 “一场饶有兴趣的斗争”——清华集团与北洋旧部的博弈/13

一、北洋社会与“预备学校”/13

(一) 病弱国度的“预备学校”:“洋化”与“官气”并存/13

(二) 从“美国式大学校”向“中国式大学”的努力/17

二、北伐功成与北平异动/20

(一) 北平知识界的乱象/20

(二) 政权鼎革与清华变革/23

三、罗家伦初长清华及其“大学的理念”/27

(一) 北上长校的台前幕后/27

(二) “整理校务之经过”/29

(三)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32

(四)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36

四、另一场博弈:在罗家伦与教授会之间/49

五、小结/51

第二章 罗家伦与清华大学的内部改革

——“学术化”与“纪律化”的纠结/53

一、学术化:从“预备学校”迈向“高深学府”/53

(一) 改革人事制度/54

(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57

(三) 改组师资团队,汇聚学术英才/59

二、学术体制机制的改革与成效 /63

(一) 营造学术空气/64

- (二) 鼓励发表成果/70
- (三) 强化学术休假/74
- 三、物理学系: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学术化”的硕果之一/78
 - (一) “学术化”改革与学术之猛进——以物理系为例/78
 - (二) 物理学系发展历程/79
 - (三) 物理学系与中国国防/82
- 四、“纪律化”:极具争议的尝试与顿挫/86
 - (一) “纪律”:清华传统气质的一部分/87
 - (二) 此“纪律”非彼“纪律”:在“纪律化”与“党化”之间/88
 - (三) 反弹:“彻底失败”的尝试/98
- 五、小结/99

第三章 易长风潮与“所有计划照常进行”

——清华、北平与南京的三边互动/103

- 一、“党治”时代的来临/103
- 二、“驱罗”运动:政学博弈的第一个回合/105
- 三、“拒乔”运动:清华与阎锡山政权的博弈/113
- 四、“驱吴”运动:清华学人与南京当局的互动/118
 - (一) 南京教育部的人事变动/118
 - (二) 吴南轩的北上与南下/120
 - (三) 清华、北平与南京的互动/133
 - (四) 蒋介石的反应与翁文灏的出长/138
- 五、“法”的两种面相:《大学组织法》与清华之“法”/142
 - (一) 《大学组织法》与清华规程/142
 - (二) “党”与“主义”定于一:蒋介石及其教育观/147
- 六、小结/160

第四章 政学互动的结果:柔性治校体制的成型

——以梅贻琦为中心/163

- 一、梅贻琦与清华:人脉、气质与时势的耦合/164
 - (一) 梅贻琦:从幕后到前台/164

(二) 校长的两重身份:“知识人”与“政治人”/165	
(三) 梅贻琦重掌清华/169	
二、近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成型/171	
(一) 权力的博弈: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171	
(二) 系主任群体:“核心”之核心/178	
(三) 非零和的分权制衡:校长与评议会之关系/188	
三、“超然于政潮”的理念与无法超越的现实/198	
四、小结/203	
 第五章 “新兴大学”在政治纷扰中崛起——学术布局的拓展与创新/205	
一、从“撤销工程系”到“增设工学院”:工程教育的兴衰与反复/206	
(一) 清华工学的“后来居上”/206	
(二) 努力的受挫:经费停付风波/212	
(三) 办学成绩/219	
(四) 矫枉过正的隐患:“理工科抬头”/222	
二、兴废之间的挣扎:法律学系的嬗变/227	
(一) 由“兴”而“废”:法律学系的遭逢/227	
(二) 究缘:法律学系兴废的台前幕后/250	
三、农科的兴废:从裁撤农学系到增设农研所/268	
(一) 农业中国与民国大学/268	
(二) 清华与农科的离合/271	
(三) 关于圆明园实验农场的博弈/279	
四、航空工程:政学合作与中外互动的典范/283	
(一) 远东政局与中国航空/283	
(二) “救国”与“读书”的变奏/287	
(三) 政学合作:双方关系改善的机缘/289	
(四) 中外学术合作典范/296	
(五) 历史意涵及其他/302	
五、小结/303	
 第六章 “党国”、“民国”与“杰出大学”——办学成就及其限度/306	

一、本校“文法数科亦并不弱”——体制创新与多科性综合型大学的建成/306

二、表征：“母校在美声誉之佳”——国际能见度的显著跃升/311

三、历史意涵：中国大学界的结构转型/340

四、“未完成的近代化”：远东大学史上的清华/350

五、小结/359

结 语 政学互动的历史图景/361

致无尽的苍茫岁月(代跋)/381

主要参考文献/390

人名索引/400

绪论 民国大学的面相：学术乎？政治乎？

缘起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名校，其中清华大学是比较突出的一所。它和北京大学等许多名校一样，处于学术中心地位，引领中国知识界应对国际竞争、参与“学战”，争取学术独立。^①

其实，在北洋时期，清华还是一所名过其实的“大学校”，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已成长为一所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②对此问题，数十年来已涌现大量研究论著，但尚有某些方面值得进一步开掘。多数研究集中于对这一“结果”的观照与研析，而对这一问题的“过程”的剖析似嫌不足，深度研究更是缺乏。试问，清华的成长进程是如何开展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其运行机制如何？从中可窥见当时国内外的哪些面相？在此过程中，清华内部形态（如办学

① 按：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若干所旗舰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都先后不约而同地将对手设定为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而日本方面也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大学的显著成长，特别是在 1931 年后，这一态势尤为显著。如德田六郎即注意到，1931 年 4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邀请国联专家来华考察，共同合作推进中国教育，考察团在华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其中在平津考察达三周，嗣后对教育行政、教员培训、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中肯建议。参见德田六郎《支那教育の再建》，《帝國教育》1934 年（昭和九年）9 月号，总第 646 期，第 6 页。亦可见佐々木秀一《中華民國部分觀》，《帝國教育》1935 年（昭和十年）2 月号，总第 667 号，第 43—45 页。从中日博弈的角度审视，或可见出当时中国大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其中，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一样，尤其受国内外的瞩目。这是当时中外“学战”的重要案例。

② 这不正是国内一般人士的认知，而且国际同行也有同样的判断。1933 年，美国科学调查团对中国二十七所大学的科学师资和设备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示，清华名列前茅。W.E.Tisdale, "Report on Visit to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September–December 1933,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pp. 21, 47–48. 转引自 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3, 418.

理念、治理结构、学科布局)有何变革?这些内部变革与外部的社会政治生态是否产生了互动?如果有,又是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办学工作?其中有哪些节点?……对此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在学术史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都对清华发展的历史情境进行比较理想化的解读,认为除易长风潮时期外,清华基本上处于安定的、很少受干扰的状态之中(而在政治史视域中,论者每每强调清华的学潮及师生与当局的抗争,侧重从“革命”或“运动”的视野来理解此间清华发展历程)。历史当事人对此则更是说法万千。然而,说法纵可千差万别,事实真相却只可能有一个。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一问题,所牵涉的绝不仅仅是对清华个案的研究,而是对整个民国政治文化生态的认识问题。对此,我们还是需要解构“虚拟的历史”,返回原点,回到“事实”本身,回到“历史现场”,从原生态的历史情境中去求解。

探寻历史深层的本相

抗战前,北方知识界盛传“北大大,清华清”之说。此时在清华任教有年的浦江清也认同此说,认为在清华“大家埋头做学问,没有卷入各种政治派系的斗争”^①。清华算学系教授杨武之也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相当混乱,但清华园却是‘世外桃源’,我们的确过了幸福而又安定的生活。”^②清华学生则庆幸“在这目前这个慌乱的状况之下,我们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③;处此“糜烂的社会”,而“我们安生在这世外桃源之中”。^④此类言说随处可见。——以上都是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而非其全部。对事实的另一面,相关人等另有说辞。如浦薛凤即认为抗战前十年“局部之军事行动,派系之明争暗斗”从未休止,日寇之侵略更是得寸进尺,^⑤清华园在此时代风雨中也难置身其外。冯友兰认为,梅贻琦主张大学“超然于政治”,不干预学术

① 王季思:《跋一》,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页。

② 杨振汉:《父亲的回忆》,宗璞、熊秉明主编,杨振宁等著《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③ 北风:《我们一味夸耀之前,须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自己的短处》,《清华周刊》第三四卷第一期,1930年10月,第4页。

④ 石依:《前进》,《清华周刊》第三四卷第三期,1930年11月,第41页。

⑤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黄山书社,2009年,第170页。